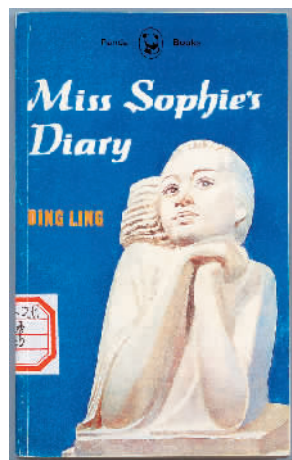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丁玲：与世界文学同行

王中忱



《莎菲女士的日记》英译本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德译本

世界文学当然应该包括世界上存在的所有文学，但文学文本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成为有生命的“活的文本”，无论怎样杰出的经典之作，只有进入跨国家跨地区跨语言的阅读，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发端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新文学，在其酝酿、萌生和初创时期，就以前所未有的自觉去汲取域外文学的营养，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在欧美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处于“被殖民”的弱势位置，中国文学，尤其是新文学，自然也备受漠视。直到国际左翼文学思潮蓬勃兴起的“红色三十年代”，中国的新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关注，与同时代世界文学产生共时性互动，丁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到域外读者视线之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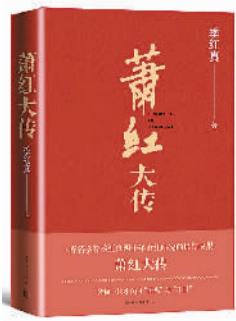
“营救丁玲”：国际左翼同声相应

丁玲最初引起国际文学界的关注，缘自1933年5月国民党特务对她的逮捕。1927年底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登上文坛的丁玲，先以描写“摩登女性”著称，不久便以《韦护》《水》等作品，成为中国左翼作家的代表。而国际文学界针对丁玲被捕事件发声，既表达了对国民党政权所制造的白色恐怖的抗议，也促成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国际性传播。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2021年是中国著名现代作家萧红诞辰110周年。她短暂而不凡的一生，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无尽宝贵的财富。鲁迅称赞她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柳亚子说她有“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她的《生死场》《呼兰河传》以平民视角为彼时贫苦的中国大地立传，写出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而萧红本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她与身边人的爱恨纠葛也每每成为读者关心的话题。

为真实还原萧红的人生轨迹、解读萧红的精神世界、探析萧红的文学创作，学者季红真积40年之功创作的《萧红大传》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50余万字、20余幅插图真实全面还原了“呼兰河的女儿”的悲苦人生，深溯萧红漂泊、孤独的灵魂，展现出一代才女的“流离”与“不甘”。

在6月5日举行的“纪念萧红诞辰110周年暨《萧红大传》新书分享会”上，与会专家认为，《萧红大传》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书厘清了以往对萧红经历认识中的诸多模糊之处与疑点，作者对萧红身世背景的考察、对汪恩甲身世及其失踪的考辨以及对萧红研究中相关史料的爬梳与鉴别颇具价值，全书“无一处没来历”的求真精神、存疑与开放的治学态度，为推动萧红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季红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当时活跃在上海的美国记者、小说家史沫特莱和她的左翼朋友伊罗生等人，不仅迅速把丁玲被捕的消息发表到英文媒体，广泛呼吁营救丁玲，同时也翻译了丁玲的小说作品，发表在美国的著名杂志《亚洲和美洲》（Asia and the Americas）上。据有关研究，史沫特莱和美国著名作家厄普顿·辛克莱都注意到了丁玲的写实主义作品里潜在的政治感召力，注意到她的小说《水》所表现的自然灾害景象，能够让美国读者联想起中西部地区的相似天灾，而“洪水”所隐喻的底层民众逐渐增长起来的集体抵抗意志，则可解读为超越了文化差异且能广泛号召不同国家和地区读者加入人类愤怒大潮的象征。史沫特莱参与翻译的《水》英译本，有意突出了原作中奔腾的洪水和急剧运动的人的身体的描写，从而把丁玲小说融入上到世纪30年代兴起的美国左翼小说潮流之中。（参见苏真《如何营救丁玲：跨国文学史的个案研究》）

几乎在同一时期，欧洲的左翼文学界也参与了“营救丁玲”的行动。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巴比塞、伐扬·古久列等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其中，伐扬·古久列是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的主编、法国革命文艺家协会秘书长，他深切关注中国及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命运，曾与以描写同时代中国革命著称的小说家马尔罗一起组建中国之友委员会。1933年7月，伐扬·古久列和阿拉贡创办《公社》月刊，翌年便登载了艾登伯翻译的丁玲小说《某夜》。艾登伯二战后曾参与萨特、雷蒙·阿隆等创办的《现代》杂志，并以研究象征派诗人兰波和古代中国文明与欧洲的关系成为享誉世界的学者。但在当时他还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旅居法国的中国诗人戴望舒帮助他，使丁玲的作品初次转换为法文便以高品质的译文呈现在具有前卫色彩的左翼文学读者面前。

同样值得一提的，后来成为布拉格学派汉学研究奠基人的普拉克也参与了“营救丁玲”。1932年他来中国留学，专业兴趣本在古典文学，但中国和捷克所处的共同境遇，让他在对中国新文学作品感受到了共鸣，而鲁迅等新文学作家为翻译弱小民族文学所做的努力，更让他感慨不已。1934年，他在捷克的《创作》杂志上发表关于丁玲的评论，第一次把这位女作家介绍给地处欧洲的弱小民族国家，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所说的跨文化译介。

透过丁玲理解中国革命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逃脱了国民党囚禁出现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丁玲，以一个文艺战士的姿态奔走于抗战烽火前线，她的传奇经历使她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对象。这一时期来到陕北采访的外国记者都竞相把丁玲作为报道对象：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

《人类的五分之一》、史沫特莱的《中国战歌》、尼姆·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等，都生动记录了丁玲的战地生活和文学创作。而在抗战胜利之际，丁玲抗战时期的新作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各国读者借以认识中国革命及革命文学的重要文本。

1944年，胡风在桂林选编出版了丁玲作品集《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丁玲作品集外译提供了便利。1945年，印度的Kutub出版社印行了此书英译本，使丁玲的名字为南亚地区人民所知。

耐人寻味的是，在二战战败国日本，丁玲也成为备受关注的作家。据以故东京大学教授丸山升考察，《我在霞村的时候》“是战后日本翻译中国抗战时期文学作品最早的一篇”。译文发表于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等创办的《人间》杂志第2卷第1号（1947年1月），在目录上和法国作家马尔罗的小说《希望》并置于一栏。该刊同年第4号的卷首位置刊出4位外国作家的近照，分别是海明威、萨特、肖洛霍夫和丁玲，在明治维新后欧美文明深度浸透日本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发生，缘自部分已经开始反省侵略战争的文学家。他们从丁玲的作品中感受到了近代以来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侮和蔑视的中国的坚强崛起和中国文学的焕然一新，战后派作家武田泰淳感佩地写道：“八年艰辛的战争，使中国作家们都在向前进步。家被烧毁，背井离乡，失去亲人，在东奔西走之间，被锤炼成锐利的刀锋。”评论家小田切雄秀则从追究战争责任的角度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认为“这篇小说是对日本人的一篇控诉书，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同时他也从书中女主人公的形象读出了“一个人的倔强”和一个民族的“坚实底力”。作为战后新一代学者的丸山升在东京大学选择了丁玲作为毕业论文的课题，他更关注的是“作为知识阶级出身”的丁玲如何“完成‘自我改造’而成为了‘人民作家’的代表”，当时的丸山因参加“五一”游行而被捕，他在狱中写给大学研究室的信中说：“现在，我每天上午读丁玲，下午读《资本论》”。由此可以窥见丁玲在日本战后进步青年中的影响。

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不仅使丁玲在社会主义阵营获得巨大声誉，也让她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通过丁玲作品了解中国革命和革命后的中国，成为很多希望了解中国面貌的人们乐于采用的观察路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国作家波伏瓦，这位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在东西方冷战格局已然形成、新中国被封锁围堵时，为了了解中国的“真实面目”，于1955年9月和萨特一起访问中国，考察了40多天，回国后又做了大量的文献调查，两年后出版了题名《长征》的“中国纪行”。《长征》包括了作者所观察的

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从农民、家庭到工业、城市，宛如一部小型的中国百科，其中屡屡提到了丁玲。在“前言”里，她说：“如果没有见过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我就不可能那么深刻地理解丁玲和周立波关于‘土地改革’的小说”。在“农民”章里，波伏瓦大量引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的情节，和她眼见的实际情况相互参照。波伏瓦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的变革实践更多地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和信任，有效推进了“社会主义和个人解放”的同步进行。这可谓是一个颇具洞见的观察，而包括丁玲小说在内的中国新文学作品，为波伏瓦的观察提供了资源和参照。

用行动回答世界文学重要命题

波伏瓦的《长征》当然谈到文学，其中“文化”章里的“文学”一节，几乎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波伏瓦以赞赏的语调谈论丁玲的《桑干河上》，但也坦率地批评了小说结尾的简单化处理。在讨论到作家的主体经验与文学写作之关系时，她特别提到丁玲的文章《生活与创作》。针对丁玲提出的作家应该深入生活的呼吁，波伏瓦首先给予肯定，并认为丁玲本人“长期参加革命斗争”，是“真的深入到了人民的生活当中”，但她对丁玲的经验能否普遍适用不无担忧，因为一般所谓的“深入生活”仍然是作家的由上而下，可能只停留在“了解情况”，而做不到从内心分享人民群众的经验，并将之内化为自己的体验。波伏瓦认为丁玲的建议“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太宽泛了”，在她看来，只有当“文化成为工人和农民熟悉的东西，语言不再使他们感到惧怕，那样，他们就能真实地讲述自己的生活了”。很显然，波伏瓦期望的是真正“来自人民”的作家，是工人农民的直接叙述和书写。实际上，作家与人民的关系始终是世界文学所需要面对的课题。

在北京访问期间，波伏瓦曾受到丁玲的家宴招待，但没有就上述话题进行交流。丁玲一直没有读过《长征》。1983年，她访问法国，老友重逢，波伏瓦也没有重拾旧日话题。不过，从另外的角度看，丁玲1950年创办并主持文学讲习所，目标就是想让“来自人民”的青年学会文学写作。1958年到北大荒后，她尽心竭力地教农场女工识字，当然也是希望她们能够学会自我表达。1979年复出文坛之后，丁玲最先写出的作品是记叙农场女工的小说《杜晚香》，访问法国期间，送给法国朋友的礼物也是这本小说的法文译本。既帮助底层人民学习自我表达，也为底层人民代言，丁玲以这样的行动，回应了波伏瓦的问题，也回应了同时代世界文学的前沿性课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配图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我抬头望一眼初升的太阳，连绵的群山之外，有一个地方叫昆明。那里生产绿色包装的春城牌香烟，故乡的人们叫它“青蛙皮”，视若珍宝。火柴也出自昆明火柴厂，黑头小鬼们齐排排簇拥着，抽出一根根轻轻一划就变成火焰。那时我以为火柴盒是魔盒。那时我在故乡大凉山，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在昆明安身立命。

这世界有那么多城市，我们只能择一栖居。就像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只有一人能陪伴终老。这是我和昆明的缘分，是我儿时遥想它的回应。

2003年，一辆风尘仆仆的客车将我吐在菊花村客运站。楼房如林，让人眩晕。可是，我要像一株羞怯的稗子，在这坚硬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我的背包里有两本发表过我作品的文学杂志，这微弱的梦想一如多年前的火柴之光。

那时的滇池路还算是城郊，低调的别墅掩映林中；渣土车横冲直撞，黄尘滚滚；44路公交车从海埂公园开往昆明站，需要和同一路线的私营中巴抢生意。而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那时年轻，双脚便是马达。滇池在几公里外。小商贩在大坝上卖裹了鸡蛋清的油炸小白鱼。一转身，在水里看见它们那些幸运的同伴，我吃不下了。

当时的职业是房产经纪人。一群和我一样来自乡村却不甘平庸的同行，狡猾如黄鳝，刻在心上的就是4个字：出人头的。白天带人看房，看得心里哀伤——这城市，这么多房子，没有一间属于我。而夜晚却不一样。拉下卷帘门，10平方米的办公室，属于卡夫卡、杜拉斯、库普林、劳伦斯等人不死的灵魂。有时候白天也读，不忍释卷，难免错过客户。我的中篇小说《四〇一》正是源于这段经历。

我的写作始于抵达昆明之前。但是这座城市让我坚定了写作的道路。我曾有一段出没于一二一大街的经历，那里有著名的西南联大旧址。当年的教室还在，不远处是闻一多的衣冠冢。一二一大楼里有来自清的蜡像，还有他出的试卷。如果时光倒流至1937年，我会在这些街上遇见刘文典、陈寅恪、沈从文、钱锺书……几十年后，毕业于这条街上的云南大学的著名诗人于坚在《昆明记》里写道，“昆明是诗人们之城”。

我在昆明度过了最好的年华。年轻、消瘦、冲闯、倔强。当天从凉山转走了户口，我知道，这一辈子都要生活在昆明了。“好在”是一句昆明话，舒适之意。昆明好在，我选择在这里居住。我清楚记得我住在某个地方时，写下了哪些作品，我们相互见证。它知道我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写作者，我知道它2003年后的变化。至于更前的昆明，在于坚的《昆明记》里，在罗养儒的《云南掌故》里。

身处昆明，回望凉山，我的小说就产生于这个空间里。昆明和凉山，我的两个家乡。一个用来回忆，一个用来生活。仿佛隔得远了，那些人物才会在记忆里活起来。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大概不会写出跟昆明有关的小说了，因为我没有离开的打算。

（作者为《滇池》文学月刊副主编）

马敏绘
图片来自网络

山水行吟 源头诗意

——读周华诚《素履以往》

李钊

周华诚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曾经拼尽全力从乡村走入城市，拼搏多年后再度回归乡村的周华诚来说，于乡野间品味月光溪水、晚霞落叶、鸟鸣虫吟、蔬菜美酒，找寻心中的诗意和宁静，是他最向往的事。流连于山野的过程中，他将感受到的温柔和美好付诸于散文集《素履以往》，将山野间蕴含的无穷深意留给读者，留给未来。

《素履以往》分为《月光溪水，晚霞花朵》《鱼的生活方式》《林中的秘密生活》《只向美好的事物低头》4个章节，围绕山城浙江开化的景物、美食、自然、人文等进行书写，以满怀深情的乡野之爱，用视觉、味觉、听觉，用心用情探寻日常生活背后的诗性与诗情，发现寻常背后的隐秘美好。

只有走进乡野，才能欣赏它的与众不同。伴随周华诚的笔触，读者在山林间不断行走，领略到令人满心愉悦的乡野之美。一山一水、一树一花、一屋一池、一人一物，如清泉流淌在眼前，极富生命张力。乡野的风情和气质，往往藏在升腾的烟火里，乡野之间的食物更能治愈疲惫忧伤，让幸福得以放大。素履行田间，作者于山野品尝到高山茶、清水鱼、汤瓶鸡，也与深藏于街角深巷里的小杂鱼、气糕、肉圆、青狮等地道美

食相遇。书中写到的厨师老余让人印象深刻：热爱书法的他生活的哲人，“做菜的时候，锅铲就是他的毛笔；写字的时候，毛笔就是他的锅铲。做什么不重要，用什么心思去对待，才是最重要的。”不急、自在、坚守、回归，凝聚成他的人生哲学。

山野间，人与自然的对话和交流，可以获得智慧和幸福。如何让森林说话呢？周华诚在秘境之眼“听”到金钱豹、白颈长尾雉、白鹇、赤腹鹰等动物和苍松翠柏发出的自然之声，也在行走与探寻中学习到跨物种的言说和交流。作者用全身心的沉浸式体验，聆听自然之声与自然守护者心声的齐鸣协奏，让一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交响乐在文字中回响。

于乡野间流连，作者更找到了乡野中人的“心之所向”。《寻纸记》一文中，造纸匠人黄宏伟将一腔心血投入传统的手工造纸，多年的田野调查和反复试验，让传统造纸技艺回归人们视线，一片薄薄的“开化纸”留住了传统，也留下了山城的根与魂。在黄宏伟身上，我们不仅品味到了传统之美，读到了人心之美，也更透彻地了解了山城文化的根与魂。

人生匆匆，许多美好的事物都近在眼前，却因为太熟悉、太“普通”，没来得及细细品味。或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停下脚步，出去走一走，感知和触碰隐藏在乡野的美好，去探究哪一种生活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

《蜀葵1987》展现上海风貌

本报电（曾宪钦）6月5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城市年轮画：复活各个时代的上海——禹风《蜀葵1987》作品分享会”在京举办，作家石一枫、评论家从治辰与该书作者禹风展开对话。

《蜀葵1987》以小说的形式回溯与重构了上世纪80年代上海生活的方方面面，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商界人士、市民阶层、公务员群体等形形色色人物的登场，巧妙编织起一幅富有时代气息的上海画卷。

石一枫认为，《蜀葵1987》中的女性形象异彩纷呈，可以视作是微缩版的沪上十二钗。从治辰认为，禹风写出了上海特有的质感，看似写青春和爱情，实则写出了上海的城市特点、上海人的性格和上海的历史、上海跟世界的关系等。

《朵朵的星》讲述“被点亮”的故事

本报电（邹金涛）作家乔叶首部儿童文学作品《朵朵的星》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朵朵的星》是一部具有幻想风格和寓言色彩的童话，讲述了小女孩朵朵为点亮自己额头的“星星”四处寻觅、尝试，感悟到亲情、友谊、智慧与信任的故事。

“点亮星星”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当星星被点亮，便获得了智慧。作者乔叶认为：“当精神被某个人、某件事物或者某种兴趣爱好焕发出内在的光亮，从而更爱生活和自己，都属于被点亮。”

纪念萧红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新传记

展现一代才女的一生